

READING WEEKLY 阅读周刊

独立书评

实习生 苗晓雨

在房地产圈结交不少人之后，李承鹏开始挖空心思地构思与拆迁有关的故事，其中很多故事都是悲惨的。但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构思的这些故事，远不如现实世界的故事更悲惨。

大约在7年前，李承鹏着手写一些房地产专栏，在此期间认识了不少开发商、房地产销售商还有钉子户，在与他们接触时，身为记者的李承鹏发现，单用新闻报道的方式进行披露，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写作诉求，他尝试着换一种方式，用文学的手法来呈现眼中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他洞悉文坛现状，觉得现在的作家很少有人愿意为当下的人去写作，去发声。这些人的爱与忧愁，他们每天最关心的诸如房子、户口、物价、计划生育、食品安全等问题，都没有被写成文学作品。于是他产生了一部拆迁题材小说的念头，并在2009年8

给暴力拆迁安排个光明的尾巴

月开始了创作。

3个月后，小说写到将近6万字的时候，“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了。当时，李承鹏刚好在成都。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反复删除，这更坚定了他把这本书写出来的决心。尽管他已经发现，小说写起来很累，中间还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删节。

在书里，他用自己的方式对唐福珍进行了追念。那个因反抗强拆而自焚的虚构人物“唐巧珍”，几乎就是现实的翻版。

他用文学语言重述了那段被新闻记者们反复记录过的场景：“瘦小的唐巧珍像一个燃烧的火把，右手还高举着一只汽油瓶，空气中响着噼噼啪啪的燃烧声，可她动也不动，保持着这个姿势，原来竟已烧得炭化了……”

2011年1月，以拆迁和抗拆为主题的小说《李可乐抗拆记》，终究问世了。

在暴力拆迁的残酷现实面前，《李可乐抗拆记》用文学化的手法软化了许多赤裸的拆迁现场，更多的是通过主人公的嬉笑怒骂与蜕变过程来寄托作者的思考。主人

公李可乐目睹并亲历了强拆、冲突、断臂、自焚以及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这一系列事件后，最终脱胎换骨，和丁香街的居民们一起走上了“钉子户”的抗争之路。

小说里描述抗拆过程的时间维度被刻意拉长，往往一夜之间的变故，作者却洋洋洒洒十几页的篇幅，但读者并不会觉得拖沓，因为每一段章节中，总是到处穿插着百态的人物——拆迁办主任、房地产商、菜刀妹、诗人愤青、暴发户、妈妈桑高姐……每一个人物特定的言语、动作、神态以及彼此的互动，都被略显荒诞而幽默的语言所呈现，让人印象深刻。

在描写拆迁双方的对抗上最为精彩，既有血肉腥风来临前双方在擂台上的战前演说，也有开战之后双方的尔虞我诈、兵来将挡，作者运用夸张的语言营造出两军交锋的阵仗，掺杂了众多幽默的元素，让双方的对抗变得极富画面感。钉子户们抗拆的手段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弓弩、烟花、捕鼠器、502胶水……信手拈来，各尽其能。

据说，李承鹏创作这一部分时，一边走

访北京和成都的钉子户，听取意见，搜集素材，一边自己发明这些新奇的抗拆手段，力图让章节既符合生活常识，又能体现出文学化手法的夸张处理。

不过，这些汇集了现实悲凉的作品，读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尽管情节中有自焚，有流血，有伤亡，有小人物的倾轧与挣扎，但是字里行间的氛围，并未让人感到末日般的绝望。

到最后，李承鹏特意对故事安排了一个“光明的尾巴”，那里“有修葺一新的街道和房子，幸福生活的人们”。如他所说：“安排这样的结尾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文学不可以改变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还是希望大家看到希望！”

李承鹏说：“我希望拆迁的人和抗拆

迁的人都能看到这本书，我会给利益迥然不同的双方一句同样的话：爱同类！”

在这场虚拟的暴力抗拆角逐中，各方均有收获。主人公一路跌跌撞撞，最终得到了追逐已久的爱情；钉子户们重返家园，沐浴在“小丁香街”幸福的晨光中；



拆迁方呢？或许得到了一颗惻隐之心。李承鹏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明白，铲车拆掉的那些破旧建筑，对自己而言可能只是一个任务指标，只是一堆尘土弥漫的废墟，而对别人而言，那也许就是他全部的世界。

正如“黄宜拆迁事件”当事人钟如力所说的那样。在《李可乐抗拆记》的首发式论坛上，钟如九以嘉宾的身份亮相。她说：“我希望新的《拆迁法》的出台使强拆被停止，我希望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能有一个平静美好的家。”

歌词两端系着不同的人生

林特特

小时候，我爱读歌词。

一有钱，我就去买《舞台与银幕》。那份报纸上，有我最喜欢的新歌歌词栏目。“又见雪飘过”“风吹来的砂”……往往，没听到这些歌前，歌词我已熟读。

那时，学校的音乐课多是各民族民歌；这满足不了我热切想进入成人世界的心；而“太阳出来了，喜洋洋”也不如“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给我更直观的文字美。

一日，我买了本书，《流行金曲一百首》。书中，每一页是一首歌，印着简谱和歌词。

“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是我的哀愁……”十几年前的一个夏日，我们五六位女生围着一张课桌，用胳膊肘做镇纸，对着《流行金曲一百首》中的一页低声唱。

《恋曲1990》带给我极大震动。现在，我才能准确表达它：除了来自成人世界的情感，我没见过这么奇特的词语拼接，以及这种拼接构成的意象。

这首歌的下一页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羞赧地笑，唱得更低了。

“不回家的人”、“不开启的门”、“眼神”、“双唇”……此前，我背诵过许多诗词，我知道那是韵，但流行歌曲更为凸显了韵的魔力。两个月后，我在书店发现一本淡绿色封面的《诗韵新编》，想到“人”、“门”等等，如获至宝。

歌词是一场正统教育外的文字启蒙。

从《流行金曲一百首》起，我开始关注词作者：厉曼婷、娃娃、陈乐融、林夕……名单越来越长。我想象他们的模样，为他们的词想种种境地。我还自创一个游戏：看到一首好词，便随意掩住一个字，填字、猜字，再看原字。高三，我在同桌手抄的《笑红尘》上，用指肚按住两个字，再放开，恰是我猜的“逍遥”。那一阵子的欣喜，如在词的两端，和作词人相视一笑。

后来，我读到《笑红尘》背后的故事。词作者厉曼婷称，那时，她刚进滚石不久，恰逢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要写主题曲。当天下午，她在咖啡馆坐了两个小时，回来后就交稿了。李宗盛看完，一言不发，只是一直盯着她，用“蛮严肃的眼神”。

我没想到这便是一首词的生产流程。

这故事和其他类似的一同出现在《我，词作家》中。我翻看该书目录，那些名字我都关注过啊。今夕何夕，像一场揭秘。

原来，陈克华是诗人出身；方文山写了一百首歌词四处投稿，只得到一个回复。

许常德是“标准的电视儿童”，又自认为擅长写作，于是决定创作歌词。一个月内，他写了70多首，后来便和齐秦签约了。

林秋离为追求妻子熊美玲而作词，直是他的《哭砂》被传唱一时。熊美玲的哥哥们才“确定妹妹不会饿死”。

原来，一首歌词的诞生要历经下单、采购、竞标、生产等流程。词作者得面对随时可能无功用的“大比稿”竞争方式；作品会被无缘无故地修改，十一部曲，有的歌词“改出来，我看了会昏倒”，而厉曼婷干脆当场宣布，某某的曲，别找她填词。

原来，他们对时的歌词颇有非议。杨立德评，“歌词是一个思想”，但现在的歌词“没有思想”。丁晓雯则说，“现在很多词在文法上不通。”

但，写出好歌词让他们有创作的快乐。

还是杨立德，“在黄金时代，写了些经典的歌”，“那些作品影响了当时青少年的思考”，让他觉得有成就感。陈乐融把写歌词喻为“文字与音乐的拔河”，但“成就一个关乎七情六欲的微型戏剧”让他深深陶醉。

握着《我，词作家》，我又想起我的那本《流行金曲一百首》了。

我想起的种种境地逐一被驳回，但歌词背后的故事，那些词人真实的形象逐渐清晰。

我在书店查看系统上搜到与之相关的书，《词家杂忆：香港16词人访谈录》、《亲爱的，我们活在最好的时代》、《原来你并非不快乐》……

其实，在词的两端，施与受的人毫不相干。

但我突然意识到，一本书可以为一本书作解；一类书可以还原一个情绪；在书的两端，是时光给时光答案。

书里书外

在“文革”年代遇见孔子

读者

梅小

全球一体，美丽欧风，似乎无以抗衡。不意“国学”大噪，网络、电视，各种“先进”的传播方式，都在参与鼓吹古老的《论语》和其他传统经典。

与今天的“提倡”不同，我是在怪异的背景下接触《论语》和蒙学读物的。

1973年夏天，我结束了“知青”生活，从内蒙古农村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一家小工厂。因为年轻，精力充沛，又多少识几个字，我不久便和几个青工一起，被指定为“工人理论小组”成员。搞“理论”，原则上不脱产，但经常要外出听报告，回厂后在大会上“宣讲”，风头十足，本职工作却往往得由师傅们代劳。

那么，被称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我们这些人，听了些什么报告，又宣讲了些什么呢？

听了“批林批孔”，宣讲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反动透顶”；听了“评法批儒”，宣讲了“儒家开历史倒车，法家进步务实”；听了“破旧立新”，宣讲了“儒家反动、庸俗的人生观、世界观必须彻底批判”。当然，后来还有“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评《水浒》”和“批邓反右倾”。

事情并不难做。把听讲的记录和上级分发的学习材料捏合在一起，再从报纸上抄几段“梁效”，讲稿就攒出来了。宣讲时，不要疲沓，也不要亢奋。不会有人批评你抄空话、空套，要的就是重叠和虚浮。师傅们的轻蔑、宽容，我自己的下乡阅历，都明白白地告诉我，这不过是逢场作戏，谁当真，谁造孽。

然而，有趣的事情就发生在此时。我惊喜地发现，上级分发的学习材料中，除了《论语》批注，竟然还有《名贤集》、《神童诗》、《弟子规》和《三字经》，甚至《朱柏庐治家格言》。对于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根本不了解批判对象的我而言，这些材料无疑是启蒙宝库。既云“批注”，抛开

“批”，对《论语》原文的字词句意总得“注”一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读到《论语译注》，我才知道那些“注”尽是袭用杨伯峻先生的。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它毕竟让我窥见了一点点儒家经典的初始面貌。那温雅、简洁而又铿锵、凝练的语句，浪漫、超脱而又冷静、聪慧的意蕴，瞬间就挤扁了篇幅远远大于原文的斥资之词。

我知道了“仁”和“泛爱众”，知道了“有教无类”，却不觉得它们“虚伪”；我惊异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决绝，却不相信孔夫子会坚持殉人殉；我感动于“君子谋道不谋食”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悲壮，却不认为这是“老顽固复辟不成的哀叹”；我陶醉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却丝毫感觉不到这是当老师的在“拉拢、腐蚀青年学生”。

如此滑稽的“开蒙”，从孔夫子生活的年代直至今，有谁经过过，又有谁能预料到？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看到我拿来的批判材料，师傅们一反常态，抢着

金应熙：叛逆还是精英

读书人



金应熙热情高涨。1958年，听到上头放出批陈的风声，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府，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张贴大字报，指斥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的“反动”。唐君毅把它抄录下来，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从此，金

被刻上“背叛师门”的红字，尽管金后来负荆请罪，跪地求饶，但陈只淡淡道：“你走吧，免我误入子弟。”决然将其逐出师门。

然而，这场“师门恩怨”其实也有多维角度。与金亦师亦友的金羽生，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金应熙中学在香港读名牌英皇书院，高中会考名列榜首，大学读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年年第一。其人性情豁达，迹近象鼻，博闻强记，学术涉猎甚广，可谓聪明一世。据梁回忆，1958年，有人问金念过多少首唐诗。答曰2万多首。闻者惊疑，因为《全唐诗》总数才4万多首。但梁羽生对此不存怀疑，因每有学生问他唐诗出处，他都可把整首诗念出来，解释其中典故，被誉为“懂得加记得尤其难得”。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金把自己的研究重点由学术转向政治，时常作政治报告，听者爆棚——左倾、逢迎、反思，正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

大学生村官为基层组织增添新鲜血液

(上接1版)

据了解，中央有关部门最近已经确定，中央财政补助的大学生村官名额将到20万增加到30万。加上各地自行选聘的，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40万人，覆盖三分之二的行政村；到2020年将达到60万人，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

从“学生娃”到“多面手”

在贵州息烽县鹿窝乡华溪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邻里思想做不通，就找村里张支书。”

百姓口中的这位“张支书”名叫张锋，2009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法学专业毕业后，被鹿窝乡党委派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点村——华溪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主管综治和调解工作。

“当时村里确实比较乱，姓氏之间、村组之间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扯皮。”张锋说。为了从根子上化解村民矛盾，他从抓

(上接1版)

村民称他们都是附近挂子山村的村民，修坟的地是村里的集体土地，每座坟的费用在四五百元不等，主要包括地皮费、水、石灰、石碑等材料费和人工费。越靠近王陵封土堆和神道石像，地皮费就越贵。修坟业务由村民小组统一管理，钱主要先将费用交到村民小组有关负责人手上，再由负责人进行分配。负责修坟的村民得到的是人工费，而每年年终村民都会从村民小组得到一定的分红。

记者发现，王陵保护区内的坟主除了桂林本地人外，还有不少来自湖南、广东等地。村民说：“有的坟主是外省的，清明节和平时没有时间来护理坟墓，我们还可以提供日常管理服务。就像房地产公司一样，坟主选好地方，我们提供地皮包工包料修好坟，还有像小区物业管理一样的一条龙服务。”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现如此乱象，其背后是有关部门监管的缺失。如

在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刘庄镇青山湖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大学生村官刁海涛，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大力开展党建工作，改变了原来党支部混乱、党员拉帮结派的状况，赢得了村民一致好评。

“许多大学生村官谈到，天天与群众打交道，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增强了解决实际问题、做好具体工作、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中组部组织二局有关负责人说。据统计，截至目前，累计有753名大学生村官被选任为乡镇领导干部，1.5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公务员队伍，全国共有3万名大学生村官带头创业，在岗大学生村官总数的14.7%。

从“外乡人”到“家里人”

“我是农村人，我愿意扎根在农村！”从村支书助理到村支书，大学生村官姚斌在贵州省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回龙镇坪寨村一干就是五年。2010年的换届选举中，他高票连任村支书，成为兴仁县唯一一个由村支部党员选举产生的大学生村官。像很多大学生村官一样，初来乍到的

记者问村民：“你们在王陵修坟有人管吗？”一名村民说：“这些都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地，谁来管呢？在这里修坟，我们村还可以提供劳力。”

记者问：“靖江王陵可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修坟算不算违法？”村民回答：“哪里有什么违法的呢？要是违法，政府早就来管，来查了。”

部门互相推诿 政府难辞其咎

6万多座私坟何以堂而皇之地侵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部门的监管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说起靖江王陵的保护，曾祥忠十分痛心。他说，上世纪80年代初，桂林市郊区扩建将几千座坟墓迁入靖江王陵保护区，在王陵核心区还建成了一个火葬场，“当时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意识不强，造成私坟

曾祥忠表示，大量的私坟人侵入靖江王陵保护区，背后有殡葬主管部门的纵容和不作为。自靖江王陵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以来，就不断提出要清理保护区内的私坟，但一直没有清理。政府不但没有清理，反而让保护区成为接纳其他地区清理私坟的地方。”曾祥忠也曾与周边村民多次交涉，由于文物部门没有执法权，结果遭到村民反咬：“人家民政和国土都不管，与你文物部门有什么关系？！”

面对监管不力的指责，桂林市殡葬管理处办公室主任蒋涛说：“民政部门也没有执法权，你让我们怎么管？我们几次进去调查，都被村民围困。光靠我们一个部门根本管不了。”

蒋涛新表示，2005年来，桂林市殡葬管理处曾针对桂林市乱埋散葬情况进行多次调查，并形成报告提交给桂林市政府，建议政府对包括蒋涛王陵在内的乱葬坟区进行

其人散漫自由，形容省略，并无心机，仍有多例可以证明。其一：在岭南大学，年轻时代的金应熙曾追求盘女生未遂，失魂落魄。那年暑假，盘女生的男友来岭大探望，金居然给他安排住所，照顾得无微不至，自称对盘女生的情感早已升华——其性情可见一斑。其二：据说，“四人帮”被打倒后，公安部门请金应熙作一个报告。究问他一个人回去，走到街上，蹲下观棋。正有警察跑过来赶走这些逛街的人。他起身慢，被猛地踢了一脚。警察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刚才作报告的那个人吗。

历史的大漩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当时的气氛，按照岳南的描述，“站在无产阶级阵营中的‘革命者’，如饥似饿的狼群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嗅到远处森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野性横生，对猎物追逐、捕杀、撕咬。”金的选择，是品性使然，还是历史必然？是缘于内心的正义，还是迫于生存利益？是纠结于犹疑多思的内心，还是恐惧于政治高压的威压，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按梁羽生的说法，其中包裹一种“甚难评说的人生”。

梁羽生在《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一

文中为金应熙一辩：“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说到金应熙谈寅恪对历史现实的情感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只就揭批的实际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好友之间所用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义与私隐”似乎有点重。”

也有人会说金善于观察风向，开会时往往往两份发言稿截然不同的发言稿。梁羽生道，……即使是，以金的聪明和特强的记忆力，何须花此笨工夫？中学生的辩论比赛往往临时抽签决定正反双方，可以即时发言，金应熙岂有不能之理？

在政治风潮席卷之时，准备两份发言稿的人，实在不在少数。岂止彼时？即使现世，墙头草、见风倒舵，仍是万能的生存智慧——历史大事件，往往往人逼反到最后那一刻方能考量其品性质地。不能进入历史的小事件，处处也显现对品性质地的逼仄与考量。你又准备几份发言稿呢？

姚斌也曾遭遇梦想与现实的落差。被村民视为“外乡人”的他刚开始工作时感到十分吃力，但姚斌没有回避，而是主动起来，慢慢适应、熟悉工作。

为了修通一条可供农机通行的道路，姚斌和村干部一起到多方筹措资金，带领村民出工出力。了解到村民脱贫攻坚生活困难后，他及时找有关部门协调，为熊正明家申请到了粮食补助、低保和18500元的农房改造补贴。2010年底一早，他带领村干部等为困难群众送水送粮，坚持数月之久……

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从帮助村民办理一件件“小事”起步，姚斌逐渐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如今，在村民眼里，他早已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家里人”。“他为我们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实事，我们信任他，希望他多干几年。”村民龚修建说。

三年来，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基层后，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村民朝夕相处，有的还同吃同住，在田间地头赢得了农民的信任，与农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浙江余姚市阳明街道北郊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28岁的大学生村官鲁炎锋当

曾祥忠表示，大量的私坟人侵入靖江王陵保护区，背后有殡葬主管部门的纵容和不作为。自靖江王陵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以来，就不断提出要清理保护区内的私坟，但一直没有清理。政府不但没有清理，反而让保护区成为接纳其他地区清理私坟的地方。”曾祥忠也曾与周边村民多次交涉，由于文物部门没有执法权，结果遭到村民反咬：“人家民政和国土都不管，与你文物部门有什么关系？！”

面对监管不力的指责，桂林市殡葬管理处办公室主任蒋涛说：“民政部门也没有执法权，你让我们怎么管？我们几次进去调查，都被村民围困。光靠我们一个部门根本管不了。”

蒋涛新表示，2005年来，桂林市殡葬管理处曾针对桂林市乱埋散葬情况进行多次调查，并形成报告提交给桂林市政府，建议政府对包括蒋涛王陵在内的乱葬坟区进行

选为新一届村委员会主任，成为全市本次村委会集中换届中当选的首位“大学生村官”主任。

“村班子‘新人’涌现，表明大学生村官正完成从‘旁观者’到‘群众贴心人’‘当家人’的能力升级，也证明地方党委政府多年来倾注的心血得到了丰厚回报。”余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晓芳说。

数字显示，从去年流动的情况看，大学生村官中有48%的人选择了留村任职，比例相对较高。目前，全国已有3.5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逐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

从刚进村时吃饭都是问题，到现在“走到哪家门前就吃哪家”，在陕西省武功县农村任职的大学生村官韩伟，正和同伴一起种田，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在农村的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韩熠说，春天来了，不一定要把种子种在地里，也要把希望播种在春天里。

(执笔者周英峰，参与采写记者陈晨、石新荣、蒋芳、赵春晖、李亚彪、王澄澄、王海鹰、潘林青)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清理，但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这个问题真的难解决吗？关键是政府要不要下决心，投入力量去做。”蒋涛新称，桂林市乱埋散葬的私坟每年以1000座的速度递增，这个问题越拖下去就越难解决。为此，殡葬管理处曾与公安、国土、城管、文物等多个部门进行商谈，各部门都表示支持，但“因为没人牵头，没有经费，也就一直拖了下去，没有办法制止私坟蔓延”。

如何才能将靖江王陵的私坟清理出去，还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净？蒋涛新表示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由辖区政府牵头将公安、城管、文物、土地等凡是涉及的单位组织起来进行清理。

曾祥忠提出，要清理私坟首先要将火葬场搬迁出保护区；其次，政府要让老百姓有地方可以安葬，不让他们乱葬。政府必须拿出一片地来，集中安置保护区内的这些私坟。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